

工业化视野下的同光之际海防筹议

李 海 涛^{1,2}

(1. 安徽工程大学 思政部, 安徽 芜湖 241000;

2. 湖北师范学院 长江中游矿冶文化与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 湖北 黄石 435002)

摘 要: 同光之际的海防筹议是在清朝海防安全受到空前挑战的背景下出现的, 其规模之大、影响之深, 在晚清史上较为罕见。从工业化视野分析, 同光之际的海防筹议是对此前中国工业化活动的一次阶段总结和深刻反思。在这次思想交锋中, 中国面临千古未有之变局的时代观念开始成为朝廷重臣的共识。这次海防筹议后, 由军工建设发端的中国工业化开始延伸至民用工业和生产性服务业。同光之际的海防筹议对于推动清政府经济发展政策的调整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中国工业化发展史中具有重要意义, 可作为区分洋务运动前后阶段的重要标志。

关键词: 工业化; 海防; 洋务运动

作者简介: 李海涛(1982—), 男, 湖北大冶人, 史学博士, 安徽工程大学思政部讲师, 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经济史研究。

基金项目: 安徽省高等教育振兴计划省级优秀青年人才重点项目(项目编号: 2013SQRW035ZD)的阶段成果。

中图分类号: K25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4403(2014)06-0188-08 **收稿日期:** 2014-03-25

近世以来, 列强自海上鬻鬻东来, 面对古老中国紧闭的国门, 屡屡叩关寻衅。昔日不设防之万里海疆, 成外敌疯狂入侵之坦途。面对日益严峻的海上威胁, 海防迅速成为晚清国家防务的重要组成部分。1874—1875年的同光之际, 围绕如何加强海防建设, 清政府的军政要员展开了一场规模空前的大讨论。这场大讨论历来为学界所重视, 相关研究成果颇为丰硕。但以前的研究, 绝大多数没有突破海防、疆防、国防的研究范畴, 从工业化视角展开的研究则十分薄弱。缘于此, 笔者不揣浅陋, 拟从工业化视野对同光之际海防筹议作一较为深入系统的研究, 力图揭示此次海防

筹议在近代中国工业化思想发展史中的重要地位。

一、同光之际海防筹议的背景与组织实施

自18世纪中叶以来, 工业化便成为人类历史发展的主题。所谓工业化, 最本质的特征, 是通过技术创新, 实现机器劳动取代手工劳动。与之相伴随, 通过制度创新, 推动各层级生产组织和各层次经济结构的调整与变动。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不应孤立割裂, 而应相辅相成。作为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的结果, 社会化大生产将取代单个的或简单协作的小生产。

从海防与塞防之争的视角, 一百多年来的学术史回顾, 可参见尹全海《学术视野中的晚清海防与塞防之争》(《河南社会科学》2007年第1期); 从海防史角度, 代表作品有王宏斌著《晚清海防: 思想与制度研究》(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刘中民等著《中国近代海防思想史论》(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同光之际的海防筹议正值人类工业化狂飙突进之时。19世纪50、60年代,第二次工业革命风生水起,科技发明以前所未有的力度推动经济社会发展。作为最具影响力的两大技术发明,转炉、平炉技术使人类全面步入“钢铁时代”,大功率发电机实现了机械能向电能的转化,人类开始进入“电气化时代”。与此同时,继英法等工业化先行国家率先建立较为完善的资本主义制度体系后,随着1861年俄国农奴制改革、1865年美国南北战争结束、1868年日本明治维新启动和1871年德国统一,世界性大国工业化的主要体制障碍被陆续破除,工业化开始以加速度推进。适应工业化发展需求,电报、铁路和轮船引发了一场交通通讯技术革命。1869年,从伦敦经欧洲大陆到印度卡里卡特、全长1万海里的电缆建成;苏伊士运河使东西方航线缩短5 000多公里,极大地便捷了东西方之间的交往;1870年,英国铁路网建设率先完成。从19世纪70年代起,资本主义从自由竞争阶段逐步向垄断阶段过渡,欧美工业化国家的社会化大生产开始跨越国界、洲界,将亚非拉落后国家和地区强行拖进世界资本主义生产体系中。

从现有资料分析,1874年前,通过清政府出使人员的旅外日记,外国传教士在华创办的报纸等途径,西方国家许多科技发明成果已被介绍至国内。然而,清朝统治阶层似乎对外部世界的技术革新没有清醒的认识,更不能理解人类这场波及全球的工业化变革的历史意义。如对日本的明治维新,大学士文祥不是担忧其通过改革,国力强盛,进而胁迫中国,而是担心其“改变旧制,大失人心,叛藩乱民,一旦崩溃,则我沿海各口岌岌堪虞”,会重蹈明代倭患的覆辙。^{[1]40}所以,在技术赶超方面,很难使清政府产生时不我待、奋起直追的危机感。至于制度变革就更无从谈起。尽管如此,基于国家防务安全的考虑,1874年底,清廷召集有司展开了一次大讨论,不自觉地顺应了时代发展的客观需要。

同光之际海防筹议的发生主要受台湾事件影响。1874年5月,日本以其所谓的属国“琉球国”渔民被台湾高山族人戕害为由,出兵3 000多人征讨台湾。面对日方的挑衅行为,清政府竟“殊无把握”应付,10月,被迫与日本政府签订《台事专条》,承认日本此次出兵为“保民义举”,并付给抚恤金和军费共计白银50万两,换取日军从台湾撤兵,是为台湾事件。

从事件所造成的破坏性讲,台湾事件不能与两次鸦片战争相提并论,但其社会反响却并不逊色于后者。两次鸦片战争,中国战败,国人尚可归咎于敌情不明、将帅无能、武器窳劣等因素。但台湾事件中,对手为素来熟稔的日本。事件发生时,洋务运动已持续十余年,业已结束不能生产新式武器的历史,全国各地已先后出现了11家近代军工企业,涉及舰船、枪炮、火药等军工产品生产。清王朝自诩这段时期为“同治中兴”。台湾事件的实践证明,十余年“师夷长技”的成果并不能御敌于海上。这对中国朝野造成巨大震动,引起清政府的深刻反思。正如奕訢所言:自庚申之变以来,“人人有自强之心,亦人人有自强之言,而迄今仍并无自强之实。从前情事,几于日久相忘”,“有鉴于前,不得不思毙于后。现在日本之寻衅生番,其患之已见者也。以一小国之不驯,而备御已苦无策。西洋各国之观变而动,患之濒见而未见者也。倘遇一朝之猝发,而弥救更何所凭?”^{[1]19-20}

在此背景下,清廷围绕海防建设,展开了一场规模空前的大讨论。1874年11月5日,总理衙门提出练兵、简器、造船、筹饷、用人、持久等应办急务六条,由清廷饬交沿海沿江各将军督抚详加筹议,“以抒目前当务之急,以裕国家久远之图”,限一个月内复奏。^{[1]20}不久,丁忧在籍的江苏巡抚丁日昌递交《海洋水师章程六条》,围绕水师建设,提出六条建议:一、组建外海水师;二、沿海择要修筑炮台;三、选练陆兵;四、精选干练官员;五、北东南三洋联为一气;六、精设机器局。^{[1]24-27}该建议与总理衙门的急务六条在很多方面不谋而合,清廷遂于11月21日一起发交有司讨论。

此次讨论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874年11月至次年3月初,为地方军政大员的商议复奏

如1866年,作为第一次出访欧洲的清政府官员,斌椿在法国巴黎曾亲见电报拍发技术,称之为“电机寄信法”。(斌椿:《乘槎笔记》,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1页)1872年,来华传教士在北京创刊的《中西闻见录》曾大量介绍西方各国最近技术发明,如该刊1872年第5期刊有《泰西制铁之法》,对近代钢铁生产流程有较为详细的介绍。另,《教会新报》1873年第231期在“格致近闻”中曾介绍法拉第的电磁感应现象。

“同治中兴”的提法在同治帝统治后期即已出现,并被赋予一种建立在伟大成功基础上的褒扬色彩。可参阅[美]芮玛丽著:《同治中兴:中国保守主义的最后抵抗(1862—1874)》(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61-62页。

阶段。

参与讨论的地方大员有：北洋大臣直隶总督李鸿章、南洋大臣两江总督李宗羲、船政大臣沈葆楨、盛京将军都兴阿、闽浙总督李鹤年、湖广总督李瀚章、两广总督英翰、广东巡抚兼署两广总督张兆栋、署山东巡抚文彬、江苏巡抚吴元炳、安徽巡抚裕祿（与英翰合奏）、浙江巡抚杨昌濬、江西巡抚刘坤一、福建巡抚王凯泰、湖南巡抚王文韶、山东巡抚丁宝桢，共计16位将军督抚。此外，清廷未作要求的部分官员也参加讨论，如陕甘总督左宗棠签注丁日昌条陈单^{[2]114}，丁日昌在《海洋水师章程六条》之外，又递交《海防条议》^{[3]291}，福建按察使郭嵩焘草拟《条议海防事宜折》^[4]，候补同知直隶州知州薛福成撰写、丁宝桢代奏《条陈海防片》^{[5]27}，影响均较大。

第二阶段，从1875年3月初至4月初，是中央高级官员针对地方所提意见的复议阶段。

1875年3月6日，总理衙门奏准，地方将军督抚的意见已全部汇报至中央，在京高级官员应对此详加筹议，讨论重点为：各将军督抚“所议无当，抑或另有良谋，会议时应尽言之，以期折衷于至是。或此时筹办而异日不能坚持，及如何始能坚持历久，会议时当究言之，以期慎始而图终”^[6]。除主持讨论事宜的总理衙门外，各亲郡王会同大学士、六部九卿均须参与讨论，限一个月内复奏。^{[7]127}至4月3日，中央讨论结果全部汇总至总理衙门。所有官员中，除醇亲王奕譞和刑部左侍郎黄钰单折具奏外，其余官员由礼亲王世铎领衔，共同署名会奏。通政司通政使于凌辰、大理寺少卿王家璧除列名世铎领衔的奏折外，还各自单折具奏。

第三阶段，从1875年4月初至5月30日，是总理衙门汇总各方意见后清廷的筹商和决策阶段。

4月3日，各方讨论意见汇总至中央后，统由总理衙门整理。5月30日，奕訢“将原奏六条参酌诸奏折中，拟议缮为一单。其原奏所未及而为王大臣及各督抚等奏陈请并饬议者，另为一单”^[8]，向两宫太后提交最终讨论结果。当日，清廷作出批复意见，对几个月以来的讨论结果做出最终裁决。

1874年前，清政府围绕海防建设，也曾组织相关大员展开过三次规模较大的讨论。第一次发生在鸦片战争结束后不久，1842年10月26日，道光谕旨，要求沿海地方大员悉心讲求改善海防善后事宜。第二次出现于1850年秋，即位不久的

咸丰皇帝多次谕令沿海各省将军督抚在海上预筹防夷之事。^[9]第三次开始于1866年3月28日，清廷向沿海沿江督抚发布谕旨，要求讨论“如何设法自强使中国日后有备无患”^{[10]4,48}。同前几次海防讨论活动的背景与组织形式相比，同光之际的海防筹议具有以下特点：

其一，同光之际海防筹议是在中国海防安全再次受到外敌挑战后组织的。不同的是，这次的对手不是来自万里之遥的西方强国，而是咫尺之遥的岛国日本。

其二，同光之际海防筹议涉及的官员涵盖沿海沿江地方将军督抚和中央所有部院大臣，级别之高，规模之大，在历次政务讨论活动中较为罕见。

第三，同光之际海防筹议虽因海防问题而起，但讨论所涉及的内容远远超出海防的范围，覆盖了当时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诸多领域。

分析同光之际海防筹议的官员言论，针对台湾事件后中国应如何实现自强的问题，朝臣主要形成两种意见：一类官员认为，十余年间耗费大量财力去引进洋人技术装备，却无力应对弹丸小国日本的挑衅，据此认定夷人长技不足恃，主张回到传统社会应对外部挑战的老路上去。这以通政使于凌辰、大理寺少卿王家璧的言论最具代表性。他们声称：“洋人之所长在机器，中国之所贵在人心”，洋人机器“奇巧有余，实用不足”。中国所能依靠的，是“数千年礼义廉耻之维”。中国乏才，乃学西学之过。“不可购买洋器、洋船，为敌人所饵取。又不可仿照制造，暗销我中国有数之帑项，掷之汪洋”。在实战中，对士民“激于尊君亲上之忱”，便会有甘蹈锋刃之人，“用天下武勇，何所不诛”^{[2]120-122}。“敌所畏者，中国之民心；我所恃者，亦在此民心。纵洋人机器愈出愈奇，我不可效日本之覆辙，为所愚弄盘剥，搜山竭泽，事事师法西人，以逐彼奇技淫巧之小惠，而失我尊君亲上之民心也。”^{[2]130}地方督抚，如英翰、裕祿、杨昌濬等，意见与之较为接近。

另一类官员则主张继续沿着“师夷长技”的道路，扩大技术革新的领域，甚至进行一定程度的制度革新，藉以自强御侮。这以丁日昌、李鸿章为代表，沈葆楨、薛福成、郭嵩焘等与之意气相投。这些人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以主持者或协助者的身份长期从事洋务活动实践，对西方近代工业文明有较深的体认，其新认识顺应了历史

发展潮流,成为之后中国工业化的前进指针。

二、同光之际海防筹议中出现的新认识

众所周知,洋务运动是近代中国工业化开启的标志。同光之际的海防筹议是在近代中国早期工业化的实施效果遭到普遍质疑的背景下出现的,因此,它必然关注此后中国工业化的发展路径问题。在这场讨论中,中国该采取何种措施以有效应对前所未见而又迫在眉睫的内外挑战,这成为中国保守和革新政治势力都不得不直面的核心问题。所以,此次讨论实际上也是他们对中国未来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的一次全面交锋。同1874年前中国工业化活动的实践相比,此次海防筹议中,朝臣出现的几点新认识值得关注:

第一,开始普遍认识到中国正处于一个大变局时代。

近代中国社会关于“变局”的言论虽早已出现,但在很长一段时期内,受华夷秩序观念束缚,多数官员将近代列强侵华活动视为古代中国边患的延续,导致在危机的应对方法上不免有浓厚的传统色彩。但在同光之际海防筹议中,大多数高层官员已经意识到,当时中国所处的政治经济形势已与传统中国大不一样,而是一个亘古未见的大变局时代。

这方面以李鸿章的见解最为恳切深刻。他深入分析了古今中国防务形势之异,指出:“历代备边,多在西北,其强弱之势、客主之形,皆适相埒,且犹有中外界限。今则东南海疆万余里,各国通商传教,来往自如,麇集京师及各省腹地,阳托和好之名,阴怀吞噬之计,一国生事,诸国构煽,实为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轮船电报之速,瞬息千里!军器机事之精,工力百倍;炮弹所到,无坚不摧;水陆关隘,不足限制,又为数千年来未有之强敌。”^{[11]112-32}除李鸿章外,许多官员都认识到时代大变局的来临。如杨昌濬称:“西洋各国以船炮利器称雄海上,已三十余年,近更争奇斗巧,层出不穷,为千古未有之局。”^{[1]34}王文韶亦言:“中国之有外患,历代皆然。而外洋之为中国患如此具烈,实为亘古所未有。”^{[11]352}由世铎领衔、在京官员联名的奏折亦谈到:“庚申以来,夷人恣意横行,实千古未有之变局。”^[12]

李鸿章等人的变局观虽因列强暴戾恣睢的侵华活动而起,并未真正认识到古今社会差异之本原,然其“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和“数千年来未

有之强敌”的呼声,对警醒国人主动了解世界大势、理性认识国家处境有重要意义。这种变局观的确立,乃是清政府挣脱旧观念羁绊,推进国家各项改革的思想前提。

第二,开始重视国家防务背后的经济因素。

经济实力是国防军备的物质基础,为国防建设提供必不可少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支撑。缺乏经济实力做基础,国防建设犹如无源之水、无本之木。1874年前,清政府的海防建设只将关注重点放在军器制造方面,有“头疼医疼,脚疼医脚”之弊。同光之际的海防筹议开始关注军工生产背后的经济支撑因素。如在设定议题时,奕訢就称:“开办海防以筹饷为第一要事,实以筹饷为第一难事。”^{[2]162}丁日昌的《海洋水师章程六条》提出:“水师与制造相为表里,偏废则不能精”,主张南、北、东三洋各设一大制造局,其下各设三厂,一造轮船,一造枪炮,一造耕织机器。^{[1]27}

在筹议过程中,一些官员发表了相似的看法。李鸿章认为,从长远看,海防费用当于开源节流求之。如何开源?丁漕课税和厘金、捐输数量有限,洋税税率又不能随意提高,只能依靠发展近代工商业。^{[11]25}

郭嵩焘认为,培育民间资本,增强国家经济实力,是实现国家富强之根本。他说:“西洋立国有本有末,其本在朝廷政教,其末在商贾造船、制器,相辅以益其强,又末中之一节也。故欲先通商贾之气,以立循用西法之基。”“以中国之大,土田之广,因地之利,皆可使富也。用民之力,皆可使强也,即吾之所以自治也。舍富强之本图,而怀欲速之心,以急责之海上,将谓造船、制器,用其一旦之功,遂可转弱为强,其余皆可不问,恐无此理。”^[4]

丁日昌在《海防条议》中进一步阐释经济资源开发对国防建设的重要性,称:“外国寓兵于工,即寓工于士,故制造与行兵,概可归于一贯。中国两离之,则两缺。此其所以不能以格致为自强之本也。若夫机器局之设,必须在煤木麇集、五金易采之处,尤为便易。”^{[3]305-306}这一水师建设与经济发展互为表里、军事工业与民用工业互相

1844年,扬州秀才黄钧宰明确提到,西方人的到来是一大“变局”。在1861年之后,很多国人开始认识到中国正经历前所未有的巨变。据统计,1861—1900年间,至少有三四十人提出相似观点。(参见费正清、刘广京编:《剑桥中国晚清史》下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85-191页)

倚重的经济思想,体现出中国工业化由点到面、由浅及深的发展趋势。

由海防建设而引申出对经济资源开发的关注,这符合现代经济运行的关联性特征。虽然时人对这一规律的认识尚十分肤浅,未能深刻认识和科学阐释各经济部门之间的关系,但它毕竟改变了此前孤立、片面地看待问题的错误方法,代之以普遍联系和系统发展的认识观念,对推动近代中国工业化的全面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第三,民用工业建设获得较为广泛的支持。

1874年前,中国民族资本兴办的新式民用工业尚未肇端。在这次海防筹议中,民用工业建设被一些官员热议,预示出中国经济政策即将发生重大变化。

丁日昌《海防条议》的建设主张涉及诸多方面,已初步形成一套较为完整的工业发展方案。轻工业方面,他认为,“丝茶为‘中国大利之所归’”,主张在全国地气适合的省份一律劝植桑茶,增加丝茶产出。鉴于外国向中国贩卖棉布,越洋十余万里,犹有余利,他主张中国“自行仿造耕织机器,则丝绵无自外求,深耕可尽地利,不惟百姓可免饥寒,而利权所入当益饶矣”。重工业建设上,他认为开五金煤铁之矿,“非特利源所系,亦军事胜败所关”,“开矿一层,尤为目前军事、饷事之第一要务矣”^{[3]322-324}。

在海防密议十策中,薛福成将开矿作为筹饷之策。他说:“中国金银煤铁等矿,未经开采者,处处有之。弃货于地,而外人垂涎久矣。似不妨用彼国开挖之器,兴中国永远之利。”开采之法,包括官采和商采,“如是则地不爱宝,民无弃财,不失中国饶富之权,不启彼族觊觎之渐”^{[5]45}。

李鸿章关于民用工业的建设主张更为系统。他主张制造耕织机器,开办煤铁各矿,辅以发展铁路、轮船交通。他指出:“英国呢布运至中国,每岁售银三千余万,又铜铁铅锡售银数百万,于中国女红匠作之利,妨夺不少。曷若亦设机器,自为制造。轮船铁路,自为转运。但使货物精华,与彼相埒,彼物来自重洋,势不能与内地自产者比较。我利日兴,则彼利自薄,不独有益厘饷也。各省诸山,多产五金及丹砂、水银、煤之处,中国数千年未尝大开,偶开之又不得其器与法,而常忧国用匱竭,此何异家有宝库,封锢不启,而坐愁饥寒。”^{[11]26}

刘坤一和李瀚章也明确支持矿产资源开发。

刘坤一认为:“轮船枪炮等项,中国之人已能制造,日渐精良。惟中国之钢铁木植,顽钝柔脆,不适于用,尺寸均须取诸外洋。一旦与外洋为难,彼必不肯以铁植资我。纵有善于制造之人,亦形束手。”从解决军工业原料的目的出发,他主张,对于钢铁、木植等原料,“宜广为采办,极力讲求,毋使外国奇货可居,而我为所窘”。^{[13]23-24}李瀚章称:“直省现试办开挖煤矿,若有成效,其利实非浅鲜,各省之有煤矿及铜铁矿者,均可仿照开挖,以广利源。既可以供各厂铸造及轮船之用,其多余者,亦可出售助饷。”^{[13]16}

不难发现,民用工业建设被兴议,官员的动机不尽一致。除为军工企业筹饷和供应原料外,还有通过发展民用工业同洋商商战、实现富国裕民的目标追求。这反映出中国民族经济意识开始觉醒,传统的农本经济思想开始动摇。

第四,生产性服务业也被一些官员所倡议。

所谓生产性服务业,主要指面向生产者的服务业,具体包括交通运输、金融服务、信息服务、商业服务等行业。同光之际海防筹议中,铁路、电报、金融以及近代教育等问题被个别官员所关注,其初衷虽不一定是为生产活动服务,但可肯定的是,这些事物在出现以后,客观上会对社会生产发挥巨大作用。

其一,铁路建设。李鸿章对铁路的军事价值予以充分肯定。在谈到选派统帅管理全国防务时,他认为,“地段过长,事体烦重,一人精力,断难兼顾”,“倘如西国办法,有电线通报,径达各处海边,可以一刻千里。有内地火车铁路,屯兵于旁,闻警驰援,可以一日千数百里,则统帅尚不至于误事,而中国固急切办不到者也”。丁日昌也认为铁路不可不建,但必须具备一定条件:“铁路亦将来之所不能不设者”,“但此则须设在我海防已有可恃之后,方不致为他人所揽。”^{[3]329}

其二,电报通讯。鉴于台湾特殊的地理位置,沈葆楨在1874年春就建议:“台洋之险甲诸海疆,欲消息常通,断不可无电线。计由福州陆路至厦门,由厦门水路至台湾。”对此,清曾接受其请求。^{[14]325}此次海防筹议中,丁日昌建议在全国范围内推广电报,可收三益:“择陆地紧要繁盛之处,先设公司汉字电报,一可通军情,二可收信资,三可减邮费。”^{[3]328}

其三,银行业。丁日昌可能是第一个向清廷

建议设立银行的地方大员。在《海防条议》中，他开风气之先，建议设立银行，发行纸币，“凡官民公司皆得入股，以通天下之有无，以报随时之贴息。将来开矿一局，亦即从此公司生根。银行一设，则银纸可以通用”，“开源之端，孰大于是？”^{〔3〕}³²⁹ 银行乃百业之枢，丁日昌此论堪称见识深远。

其四，新式教育。李鸿章提出变革学校教育和考试制度想法：“似应于考试功令，稍加变通，另开洋务进取一格，以资造就。”他建议，嗣后凡涉及海防事务的省份，均设立洋学局，分为格致、测算、舆图、火轮、机器、兵法、炮位、化学、电气学数门，可延聘外国人为师。学员学有成效，可给予不同等级的封赏，甚至“授以滨海沿江实缺，与正途出身无异”^{〔11〕}³³⁰。丁日昌也主张“储将来有用之才”，分九类：图学、算学、化学、电气、兵器、机器、工务、船务、政务，“中外各馆须再加扩充，斯取不尽而用不竭，自强根本，无有重于此者”^{〔3〕}³³⁸。历史上，科举制度从来都不是单纯的教育制度，李、丁二人此议，已在某种程度上涉及变革官员选拔的制度。

其五，商业服务。薛福成建议，政府必须“体恤商情，曲加调护，务使有利可获，官吏毋许需索，关津不得稽留，令明法简”，如此一来，贸易必盛，“渐可驶往西洋诸埠，隐分洋人之利”。在此情况下，“榷其常税，专养兵船”，“以为保卫商船之用”，“富强之道，基诸此矣”^{〔5〕}⁴⁴。郭嵩焘主张仿照宋元时做法，设立市舶司管理，“官商各船，一体运载货物，由市舶司掌其籍”，“市舶司由商人公举，督抚考其声名，察其才能，檄委之，咨其名于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三年一更易，而量授以官”。^{〔4〕}这实质上触及了工商业管理体制的改革。

对于以上这些认识，在近代中国，虽然许多并非首次被提及，但是，当这些言论集中出现在权力核心层的讨论中时，其影响显然非私人或者民间层面的思想交流所可同日而语。

三、同光之际海防筹议的结果和意义

同光之际海防筹议的经济改革主张涉及诸多领域，然而，这些主张并未成为政府共识，特别是在保守势力最集中的中央政府，反对者大有人在。多数在京官员仍然高唱道义，以义理、民心、民气相邀，认为防夷、制夷的根本方法在于固民心、修主德：“防夷之法，不厌其精，而制夷之

方，贵权其要。夷人畏百姓，当固结乎民心。夷人畏天威，宜劝修乎主德，以崇尚节俭为裕国之原，以知人善任为储才之本。外思所以御侮，内思有以自强，将见圣人在上，海不扬波。”^{〔12〕}

就连颇被地方督抚认可的开矿主张，中央的反对声浪也很大。世铎领衔的联名奏折称：“各省所议，如增盐厘、借洋款、开矿厂等事，深恐流弊，易滋诸多窒碍，此议之不可行者。”^{〔12〕}奕譞称：筹饷一事，“开矿挖煤，议者有之，驳者亦有之。虽聚众难散之弊，李鸿章斥为不经之谈，以臣之愚，终难深信无疑。或仅试办于一省一地，可则行，不可则止，果有十分成效，以渐推广，尚无不宣。若遽聘洋人照洋法，各省一律举办，实非计之得也”^{〔15〕}。

尽管在京保守官员对地方革新势力的改革主张多表反对，但由奕訢掌握实权的清廷对改革派表现出明显的维护姿态。1875年5月30日，清廷发布上谕，对持续数月之久的海防筹议做出批示，除明确支持试办新式矿业外，其他诸如铁路、电报、民用工业等改革诉求，虽未直接表示首肯，但相关人事安排却清楚表明中枢的从速态度：清廷任命李鸿章、沈葆楨分头督办北、南洋海防事宜，“所有分洋分任练军、设局及招致海岛华人诸议，统归该大臣等择要筹办，其如何巡历各海口，随宜布置，及提拨饷需、整顿诸税之处，均著悉心经理，如应需帮办大员，即由李鸿章、沈葆楨保奏，候旨简用”^{〔2〕}¹⁵³⁻¹⁵⁵。同年9月，丁日昌出任福州船政大臣。在这场海防筹议中，丁日昌、李鸿章最富于革新精神，二人披坚执锐，冲锋在前；沈葆楨虽建言不多，却为丁日昌坚定支持者^{〔16〕}²²，且此前执掌船政多年，又对台湾建设多有擘划，堪称洋务健将。清廷的这一人事安排，显示出对改革势力的支持。

同光之际海防筹议后，洋务运动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1874年前的洋务运动，主要是通过军事技术移植方式，发展近代军事工业，力求在最短时期内缩小中外武器装备水平的差距，藉此实现自强目标。正如1864年李鸿章所言：“中国文武制度，事事远出西人之上，独火器万不能及。”^{〔17〕}³⁹反之，与军事工业无直接关联的经济领

王尔敏认为，盛宣怀于1882年向李鸿章提出开设银行计划，并由电报局兼办银行业务，他是晚清官绅中最早提倡开办银行者。（王尔敏：《近代经世小儒》，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88页）本文中，丁日昌议设银行的时间显然早于此。

域,则少有动作。1874年后,洋务运动从以军事为主过渡到军事、商务并举的阶段。

目前,学界关于洋务运动的阶段划分,普遍以19世纪70年代这样一个模糊时间段为限,认为前期以求强为目标,主要发展近代军事工业和建立新式海陆军,此后,在继续求强的基础上,又提出了求富目标,创建一批近代民用企业。之所以出现这种变化,学人认为这是因前期军事工业发展而使洋务派官员在资金、原料、交通等方面感到捉襟见肘,难以应对,概而言之即认为是产业关联作用的结果。笔者认为,这一解释并不全面,因为除了基于实践经验的被动认识结果,1874年至1875年间,清政府决策层主动转变政策思维,调整经济政策,对洋务运动的阶段性转变似乎发挥了更大的作用。区分洋务运动两个阶段,以同光之际海防筹议作为界线,似更为精准。

同光之际海防筹议推动了清政府经济思维的转变,促使技术革新在更多生产流通领域出现,在中国工业化史中具有重要意义:

第一,它促成晚清政府经济思想认识实现重大飞跃。

1874年前,中国工业化是一种缺乏科学合理规划的经济活动,其思想认识主要来源于对实践经验的感知,在思考问题的方法上存在孤立、片面地分析问题的弊端。但经过此次海防筹议,清政府意识到要真正实现“自强”,绝不单单是“学习外国利器”那么简单。坚船利炮的背后,必须有现代工业作为支撑。这一认识是清政府主动思考改革路径的结果,为中国工业化向纵深领域推进奠定了思想基础。另外,无论是总理衙门提出的应办急务六条,还是丁日昌的《海洋水师章程六条》,都不自觉地用系统、普遍联系的观点去看待问题。应该讲,无论是在思想认识的内容,还是在认识问题的方法上,同光之际的海防筹议都实现了一次重大飞跃。

第二,它促进了近代中国民用工矿业的发展。

矿业为近代以来实业发展之要目。中国近代矿业随着此次海防筹议的结束正式拉开帷幕。1875年5月30日,清廷谕旨:“开采煤铁事宜,著照李鸿章、沈葆楨所请,先在磁州、台湾试办,派员妥为经理。”^[2]¹⁵³⁻¹⁵⁵中国新式矿业由此滥觞。1875年,李鸿章督饬盛宣怀在湖北广济开采煤铁,成立近代中国第一个新式煤铁开发企业——湖北开采煤铁总局。^[18]此后,开平煤矿、基隆煤

矿相继创办。受此影响,1880年前后,中国新式矿业曾出现第一次发展高潮。^[19]^{186-187,218}其他民用工业部门在李鸿章等人推动下,亦被迅速付诸实践。如与民众关系最密切的纺织工业,据资料显示,最迟在1876年3月,李鸿章就已委派属员,调集资金,着手筹设织布局。^[20]

第三,它为部分生产性服务业的起步埋下伏笔。

在此次海防筹议中,李鸿章、丁日昌等人对修铁路、建电报、开银行等多有陈辞,事后二人又被畀以重任,这预示着相关事业在中国即将发端。后来的历史证明了这一点。1877年春,福建巡抚丁日昌请求在台湾修建铁路,总理衙门在征询沈葆楨、李鸿章等人的意见后,向清廷请旨:“举办轮路为经理全台一大关键,尤属目前当务之急。并请饬下丁日昌,审度地势,妥速筹策,务当力为其难,俾安内攘外,均有裨益。”^[21]³⁵⁸⁻³⁵⁹台湾修建铁路的主张虽获清廷允准,但因经费难筹,加之1878年5月丁日昌因病离任,计划最终流产。尽管如此,它表明中国修建铁路已获得官方的有限认可,铁路之兴,为期不远。电报方面,1874年沈葆楨奏准兴办台湾电报,因属员办理不善,加上群臣反对,最终流产。延至1877年,丁日昌又奏准在台湾敷设电报线路,8月动工,因经费不足,至10月只完成台湾府至高雄(打狗)一段,长95里。这是中国第一条电报线路;在大陆,1879年,在李鸿章支持下,天津至大沽之间电报线路架设,全长120里。1881年,全长3000余里的津沪电报线路竣工,这是近代中国第一条电报干线。银行方面,1876年,丁日昌接受唐廷枢提议,拟设立荣康银号,具体由一帮广东商人参与运作,这是近代中国最早见诸史载的新式银行,可惜因资本招集不易,至1877年初便无下文。^[22]

同光之际海防筹议虽有显著的积极意义,但其局限性亦显而易见,主要表现为:

其一,改革意见远未成为共识。对于如何全面推进中国改革进程,无论是在中央,还是在地方,异见纷呈,远未达成共识。思想守旧官员反对改革,自不待言。即令思想相对开明的地方督抚,亦是同心少,异见多。如李宗羲对开矿不以为然,认为:“中国开采煤铁,地气不厚,精华易竭。所费甚多,所得有限。未敢遽信以为大利耳。”^[13]¹⁷对丁日昌精设机器局、南北东三洋各设三大厂的主张,左宗棠以经费难筹、人才难得、

善地难觅否定其意见。^{[2]114-115}在19世纪70年代,像李鸿章、丁日昌一样主张大刀阔斧变革的官员尚属凤毛麟角,其推行的改革事业也必定面临巨大阻力。

第二,改革诉求缺乏制度支持。一套健全而行之有效的制度体系是实现工业化的必要条件。同先前一样,同光之际海防筹议后,清政府的洋务事业同样没有必要的制度去保驾护航。如清廷允准兴办新式矿业,只是同意李鸿章、沈葆楨在直隶和台湾“试办”,并未出台鼓励发展近代矿业的政策法规。对李鸿章、丁日昌的改革主张,也是通过人事安排的方式予以间接支持,同样没有明确的制度条文。因缺乏制度保障,此后中国的

工业化事业依然依赖于政治精英的个人影响力,这使得改革充满了变数。如台湾修建铁路的计划,因丁日昌的因病离任而中辍,迟至10年后刘铭传接任台湾巡抚才重新启动。

晚清中国,落后保守的思想(即潜在的制度约束)是阻碍工业化向前发展的最大障碍,它直接阻滞技术移植和制度创新。正如李鸿章所言,救时之要,病在“人才之难得、经费之难筹、畛域之难化、故习之难除,循是不改,虽日事设防,犹画饼也。然则今日所急,惟在力破成见以求实际而已”^{[11]114}。从同光之际海防筹议所反映的情况看,推动政府确立现代化价值目标依然是此后中国发展所急需达成的首要任务。

参考文献

- [1] 宝鋆等. 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 卷98[M]. 北京: 故宫博物院影印本, 1930.
- [2] 中国史学会. 洋务运动(一)[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61.
- [3] 张树声. 敦怀堂洋务丛钞[M]. 台北: 文海出版社, 1968.
- [4] 郭嵩焘. 为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议练兵制器造船等海防事条陈(光绪元年三月二十一日)[Z].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馆藏光绪朝军机处录副奏折, 档号03-9381-029.
- [5] 薛福成. 筹洋当议: 薛福成集[M]. 沈阳: 辽宁人民出版社, 1994.
- [6] 奕訢. 奏为请旨各省议奏海防切筹武备事(光绪元年正月二十九日)[Z].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馆藏光绪朝军机处录副奏折, 档号03-9381-006.
- [7]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清实录: 第52册[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7.
- [8] 奕訢. 奏为遵旨议奏海防事宜事(光绪元年四月二十六日)[Z].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馆藏光绪朝军机处录副奏折, 档号03-9381-031.
- [9] 茅海建. 论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初清海防筹议[J]. 贵州社会科学, 1985, (9).
- [10] 王宏斌. 晚清海防: 思想与制度研究[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5.
- [11] 宝鋆等. 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 卷99[M]. 北京: 故宫博物院影印本, 1930.
- [12] 世铎. 奏为遵旨会议筹办海防等情事(光绪元年二月二十七日)[Z].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馆藏光绪朝军机处录副奏折, 档号03-9381-015.
- [13] 宝鋆等. 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 卷100[M]. 北京: 故宫博物院影印本, 1930.
- [14] 中国史学会. 洋务运动[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61.
- [15] 奕訢. 奏为遵懿旨议海防等情事(光绪元年二月二十七日)[Z].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馆藏光绪朝军机处录副奏折, 档号03-9381-013.
- [16] 沈葆楨. 沈文肃公政书: 卷5[M]. 光绪铅印本, 1880.
- [17] 宝鋆等. 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 卷25[M]. 北京: 故宫博物院影印本, 1930.
- [18] 李海涛. 近代中国第一份炼铁厂建设计划的历史考察[J]. 武汉科技大学学报: 社科版, 2010, (3).
- [19] 张国辉. 洋务运动与中国近代企业[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79.
- [20] 陈旭麓, 顾廷龙, 汪熙. 上海机器织布局[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1.
- [21] 中国史学会. 洋务运动(二)[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61.
- [22] 汪敬虞. 中国资本主义现代企业的产生过程[J]. 中国经济史研究, 1986, (2).

[责任编辑: 秋 语]